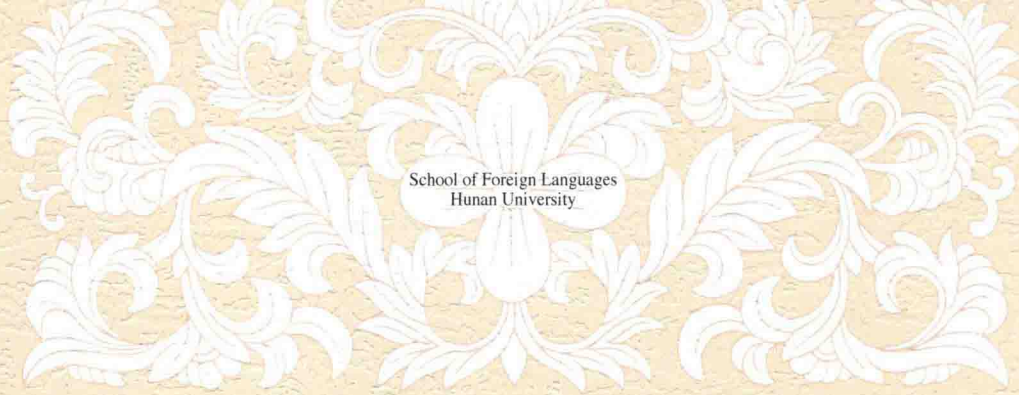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刘正光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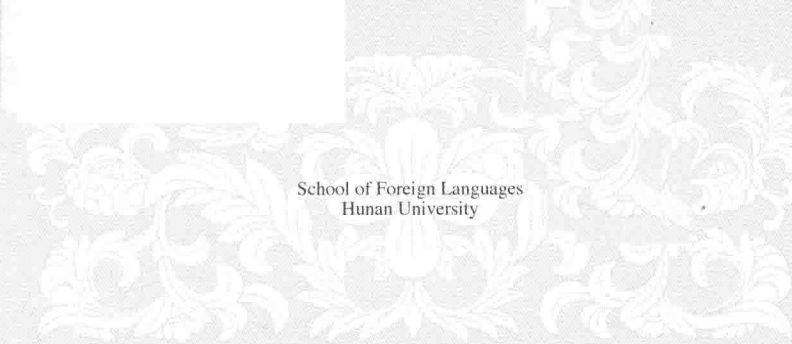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人文话语丛书

京都学派

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研究

曹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刘正光 主编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人文话语丛书

京都学派

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研究

曹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都学派：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研究 / 曹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人文话语丛书)

ISBN 978-7-5203-1574-6

I. ①京… II. ①曹…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86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09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新人文话语”是湖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推出的系列开放性丛书。本丛书 2007 年推出第一批，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五部，即《隐喻的认知研究：理论与实践》（刘正光著）、《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肖云南著）、《翻译：跨文化解释》（朱健平著）、《华莱士·史蒂文斯诗学研究》（黄晓燕著）、《亨利·詹姆斯小说理论与实践研究》（王敏琴著）。推出这个丛书的最初想法是，鼓励老师们潜心学术研究，助力学院学科发展。

转眼到了 2017 年，过去的十年见证了本学科快速发展。2007 年的时候，本学科的教授不到十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也不多。十年后的今天，本学科在 2012 年国务院学科评估排名中并列第十七位，2017 年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位列第十二，排在前 10% 的第一位。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其最早可追溯到岳麓书院创建的译学会（1897）。1912 年至 1917 年，岳麓书院演进到时务学堂以及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正式设立英语预科和本科部。1926 年创建湖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2000 年组建外国语学院。陈逵、黎锦熙、杨树达、金克木、林汝昌、周炎辉、徐烈炯、宁春岩等许多知名学者先后执教于此。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本学科凝练成了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学与文化、翻译学四个稳定且颇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理论语言学以当代认知科学理论为背景，以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研究为重点，以认知与语言交叉研究为基本范式，寻找认知发展、语言

认知机制与语言本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应用语言学以语言测试、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为研究重点，强调研究成果在学生能力培养中的实际应用。

文学与文化以小说与诗歌创作理论和生态诗学为重点，紧跟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前沿，探索文学、文化、政治、历史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

翻译学以哲学、文学理论、文化理论、认知科学、语言学等为理论基础，探索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历程和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旅行轨迹，阐释翻译与认知的内在关系以及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的互动关系。

学科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本学科聚集了一大批学术能力很强、潜心研究的中青年学者。“70后”贺川生教授在 *Synthese*（当年哲学类排名第一）、*Syntax*、*Lingua* 等一批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系列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80后”王莹莹教授在 *Language* 和 *Journal of Semantics* 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语义学论文；全国“百优”田臻（“80后”）在英汉语构式对比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本学科中青年学者学术研究成果丰富，为此，学院决定继续定期推出第二批和第三批研究成果，做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第二批推出六部著作，分别是《汉语儿童早期范畴分类能力的发展研究》（曾涛著）、《违实条件句：哲学阐释及语义解读》（余小强著）、《认知视阈下日语复句的习得研究》（苏鹰著）、《京都学派——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研究》（曹莉著）、《〈楚辞〉英译研究——基于文化人类学整体论的视角》（张娴著）、《语言边界》（艾朝阳著）。这些著作中，除第六部外，其余的作者均为“70后”，体现出学科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潜力。

第三批著作也在酝酿之中。作者的主要群体也许将是“80后”了，他们承载着本学科的未来和希望。相信也还会有第四批、第五批……

湖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快速、健康发展，得到了各兄弟院校和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为此，我们衷心感谢，同时也恳请继续呵护我们成长。

是为序。

刘正光

于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双梧斋

2017年12月12日

序 言

回顾中国的历史，晚清至民国初期，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时期最令人心痛神伤。日本两次打断古老中国之现代化和平转型的进程，堪称为祸最烈。但是话又说回来，面对西方坚船利炮与制度文化的强烈冲撞，日本及时调整国策，短时间内使国势强盛并晋入强国之林，为我国提供了一个东亚文明之现代转换的成功模板，因此，客观上它又是我国之现代化变革的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

中日甲午战争至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大致对应于日本明治时代中期、大正时代以及昭和时代早期。这一时期，我国内战外争不断，百姓贫弱，国人的尊严遭到极度践踏，一些中国人甚至自己都对自身的历史、文化乃至种族产生了怀疑和藐视。按照吉川幸次郎的说法，这一时期也是“日本人对中国最不怀敬意的时候”。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仍然有些日本学者对古代中国“怀有文化的乡愁”（尽管没法对现实的中国赋予赞美之辞），更不轻易地否定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其中，青木正儿（1887—1964）算是一个典型代表，他的一生都在试图追踪和品味古代中国的“文化馨香”。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可能与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谓“京都学派”）的开创人、他的老师狩野直喜（1868—1947）有关系，后者强调，研究中国的学问首先应当喜欢中国，对中国具有“同情之了解”。作为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人，青木正儿不仅“接着”他的老师往下“讲”，而且还接着一代大师王国维往下讲，且敢于突破，提出新解，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青木正儿在我国学界被翻译和被接受的程度也远超他的老

师。在曹莉博士的这本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之前，国内已有了一些以青木正儿的汉学成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和硕士论文，讨论也较为深入，这无疑给其研究的进一步推进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曹莉博士在经过反复的思考之后，决定集中探讨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研究。她的研究工作的展开，主要是从方法论的问题入手。正如她所指出的，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传统汉学几乎完全依附于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导，在汉学研究中罕见日本的“自我”，而明治维新之后，新汉学的成立，在方法上受益于欧洲的学术思想、方法论以及知识分类观念，日本学者把这些新观念、新方法落实于中国文化之再研究，自然会造成对传统汉学的批判和颠覆，同时，日本的自我意识也会油然而生。伴随着自我意识的生长，日本的新汉学研究者往往将汉学归置为“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文学则相应地被视为“外国的文学”，简言之，在近代日本的汉学思想脉络里，中国开始并日益鲜明地变成了日本的“他者”。因此，曹莉认为，日本新汉学的方法论首先应该被放置在日本文化之“自我”建构的层面来把握，而结合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研究，“汉文直读”便不仅仅是一种中国经典翻译的方式，而更是一种通过回归中国文化的本原来确立中国之“差异性”的探索。这一探索，始终蕴含了对日本的“自我”的本质寻求。很显然，从这样一种视野和立意来考察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研究，它的意义就限于在时间范围上对王国维的推进（明清戏曲“接着”宋元戏曲），或在某些局部观点上对王国维的深化与改进（如以亚里士多德之强调剧情与剧场结构的“戏剧观”来补充王国维对戏曲内涵的片面认知）等具体的内容，而是具有了更深层、更细微的理论价值。

曹莉对于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再诠释也有自己的特点。相比于以往的研究常常瞩目于青木正儿的“分期论”与地理环境论，她的研究则试图首先厘清青木正儿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关系。特定的文学史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文学观，因为，什么样的“文学”的性质认定，决定了对文学的实际材料与范围的认定和选择。曹

莉认为，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观”是根据西方的“literature”确定的，南北文学论也是受到西方气候与地理环境论的影响才形成的，而这些也正是“先着其鞭”的日本中国文学史著述之所以受到中国学人效仿的重要原因。

阅读曹莉此著，我感到她的为学境界有了明显的提高。她认为，一切学术研究都是一种发生学的研究，所以，她的研究自觉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标。体现在这部著作里，便是一方面能够注意青木正儿汉学研究赖以生成的宏观背景和时代情势，另一方面也能细致地梳理出青木的学术养成之根茎脉络，因此全书具有相当清楚的发展线索和逻辑层次。所引用的材料大都是日文原著，表现出较为严谨的治学态度。这部著作，在经过专家审查之后，由她所在的单位予以资助出版，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个结果。这里在祝贺曹莉的同时，也祝她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做出新探索，取得新的好成绩。

是为序。

刘耘华

2017年9月12日于沪上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形成背景及主要代表	(12)
第一节 形成背景：明治维新时期汉学的概观	(13)
一 明治初期汉学（儒学）的衰弱	(13)
二 儒学的再兴：道德教化功能的强化	(17)
三 汉学的近代化蜕变：东洋史学及中国文学科	(23)
第二节 京都学派中国学创始人：狩野直喜与中国文学研究	(31)
一 狩野直喜其人概述	(31)
二 江户汉学的遗风：护儒及君主主义	(34)
三 狩野直喜的方法论	(37)
四 狩野直喜的中国文学研究	(49)
第三节 纯粹诗文学研究：铃木虎雄与中国文学	(53)
一 铃木虎雄其人概述	(53)
二 尊重文学且主张纯粹文学的儒学者	(55)
三 方法论的开拓：中国文学评论史的嚆矢	(60)
四 外国文学与日本文学：自我主体性的确立	(63)
小结	(68)
第二章 青木正儿的中国认识、治学方法与治学走向	(69)
第一节 青木正儿的中国认识	(70)
一 大正时代日本的中国观	(70)

二 青木正儿的中国认识：以文学革命为中心	(75)
第二节 青木正儿学问方法论：“汉文直读论”	(86)
一 训读的产生与荻生徂徕的“汉文直读”	(87)
二 明治期重野安绎的“汉语正则”论	(93)
三 中国学的方法论：青木正儿的“汉文直读论”	(96)
第三节 青木正儿治学走向分析	(103)
一 治学走向转变的背景：青木正儿的中国体验	(103)
二 治学走向的宣言：《支那学研究中邦人的立场》	(112)
小结	(117)
第三章 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研究	(118)
第一节 近代日本中国戏曲研究概观	(118)
一 近代日本中国戏曲研究	(119)
二 外部刺激：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与日本	(126)
第二节 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研究	(129)
一 青木正儿的中国戏曲史观	(130)
二 青木正儿的元杂剧研究	(135)
第三节 青木正儿戏曲史研究创新的生成	(141)
一 南北框架史述模式	(141)
二 演剧意义上：戏剧情节结构的重视	(147)
三 剧场结构的重视	(153)
小结	(157)
第四章 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159)
第一节 近代日本文学观念的转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 兴起	(159)
一 “文学”观念的近代性转变	(160)
二 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168)
第二节 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175)
一 他者视野的中国文学入门：《支那文学概说》	(175)

二 文学思想史研究范式的确立	(189)
小结	(206)
结语	(207)
参考文献	(210)
后记	(228)

导 论

—

京都学派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户坂润（1900—1945）的论文《京都学派的哲学》（1932），在文章中，户坂润（1900—1945）将京都大学文科大学以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为主的唯心主义哲学团体命名为“京都学派”。^①此后，“京都学派”这一概念在许多著作中出现，^②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据哲学家三木清（1897—1945）回忆：“当时京都大学的文科大学，说它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壮观，恐怕也不算过分。哲学方面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史方面的朝永三三郎、美学方面的深田康算、西洋史方面的坂口昂、中国学方面的内藤湖南、日本史方面的内田银藏，等等，从全国聚拢来的铁中铮铮的学

① 大橋良介：《〈近代の超克〉と京都学派》，《脱西欧の思想》，新田議弘編集，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104页。

② 例如日文书籍有：竹田篤司《物語〈京都学派〉》，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山田宗睦《昭和の精神史：京都学派の哲学》，东京：人文书院，1975年；细谷昌志《田辺哲学と京都学派：認識と生》，东京：昭和堂，2008年；江上波夫编《東洋学の系譜》，东京：大修馆书店，1992—1996年；藤井讓治、磯波護编《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等。中文书籍有：严绍璁《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刘正《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

者们，正处于活动的鼎盛时期。”^①众所周知，京都大学建立之初衷，就是要创立异于东京大学学风的竞争者。京都大学文科大学于1906年成立，此后如三木清所说，文科大学各学科鼎盛发展，自然使得后来研究者对特色概念“京都学派”的最初所指不再只局限于西田几多郎为主的哲学团体，而包含更广泛的范围。这就是广义上的“京都学派”。而狭义的“京都学派”就是特指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们。例如，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江上波夫主编的《東洋学の系譜》第1集（1992）中的《狩野直喜》篇以及《内藤湖南》篇就使用了“京都学派”这一概念。^②也就是说在汉学（中国学）领域，“京都学派”成为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群体的固定所指，本书即是采用这个概念。

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于1897年，1906年设立文科大学并开设哲学科，1907年史学科设立，随后1908年文学科才得以设立。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中国学草创期，贡献最大的是狩野直喜（1868—1947）。他不仅是哲学科的创始人，同时也开创了京大的文学科。1908年12月受狩野之邀，铃木虎雄（1878—1963）作为助教授加入中国文学史讲座的授课，文学科师资力量得以壮大。1919年京都大学增设文学讲座，铃木虎雄被任命为教授。随着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相继退休，二人的学生，文学科第一期生青木正儿（1887—1964）1938年开始担任文学部教授，直至1947年从京都大学退休。可以说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是近代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学中文学研究主要草创者，而青木正儿则是继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之后的第二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因此，根据本书主题，首要做的就是梳理考察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中国文学研究，来明确京都学派中国文学研究的学风特色，以明晓青木正儿的师承所学。

① 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卷，李民、贾纯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3页。

② 详细论述见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40页。

青木正儿出生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的一个中医家庭，号迷阳，自幼喜欢书画音乐，喜欢文学。1908年，从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毕业，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中国文学讲座的第一期学生，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1911年青木以论文《元曲研究》大学毕业，在京都从事自由文化事业。1923年到东北帝国大学任教。青木曾三次来中国，1938年任京都大学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1947年退休。退休后，曾任教于关西学院大学、立命馆大学、山口大学、九州大学，1964年应邀在立命馆大学讲《文心雕龙》，下课后因心脏停搏在楼道突然去世。青木一生著作、论文颇多，收录于《青木正儿全集》（10卷），1969年由春秋社出版发行。

青木正儿的第四子、中国文化史学者、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中村乔在总结其父的学术成就说：“青木的学问可以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关于俗文学方面的；二是关于绘画艺术方面的；三是关于风俗、名物学方面的。”^① 俗文学方面，青木正儿主要从事于中国戏曲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支那近世戏曲史》^②《元人杂剧序说》，而当时的俗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青木正儿以上成就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可。同时，中村乔也指出，“但是，青木绝没有无视所谓的正统诗文文学，其《中国文学概说》（1935年）、《中国文学思想史》（1943年）、《清朝文学批评史》（1950年）等著作就是明证”^③。基于中村先生的论述，本书认为青木正儿中国文学研究可以概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戏曲研究，另一类就是整体性文学史的研究。青木正儿在《支那学研究中邦人的立场》中指出，作为日本的中国学者，必须采用西方先进的方法与模式来进行研究，具体到文学领域，就是采

① [日] 中村乔：《中华名物考·序言》，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页。

② “支那”一词历史由来已久。但近代以来，日本对其有不同的解读，包含有对中国蔑视之意。本书为了保持历史语境，不做修改，特此注明。

③ [日] 中村乔：《中华名物考·序言》，范建明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9页。

用文学的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开拓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新领域。^①由此可见，青木正儿不仅自身致力于这两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呼吁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这两方进行拓展。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治学走向，显然与青木当时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日本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本书的主体部分分两个层面，首先明确青木正儿的中国观、方法论及治学走向，然后再进一步着重对青木正儿的戏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两方面进行考察。

二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日本文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在近代以前的江户时代，朱子学被幕府推崇上升至官学地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征尤为明显。至近代以来，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大量吸收近代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思想，以往与中国的“师生”关系发生颠覆性变化。美国学者任达就指出：“中国在1898年至1910年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②作为第三者而言，任达的言说可以说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近代中日两国的“颠覆性”师生关系。事实上，中国思想、学术等方面在实现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日本所起到的重要中介作用的确不可否认。晚清到民初，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日本比中国更接近西洋式的‘文明’，而西洋式的‘文明’就等于近代国家和民族的‘富强’。”^③很多人毫不犹豫地效仿日本，步日本的后尘，追求文明进步。可以说，近代以来，日本在各方面都

① 《青木正儿全集》第7卷，东京：春秋社，1984年，第46页。

②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③ 葛兆光：《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领先于中国，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

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中国文学本身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对其历史现状以及美的法则进行体系性叙述和研讨的事业，可以说是到了本世纪（20世纪），受了西洋方法的启示才开始的。而且，比起中国人来，日本人执其先鞭。首推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为该事业先驱，但对两位先驱的研究进行继承并使之发展且产生很多独创业绩的是青木（正儿）博士”^①。吉川的这段话表明了两个事实：其一，近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受西方的研究方法模式的启示，率先步入近代学术研究行列，因而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而言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模范作用；其二，以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为代表的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在近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确，就京都学派的成就而言，俗文学领域的开拓、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等近代文学研究范式的确立都与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尤其是青木正儿在文学研究领域，除了继承第一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事业外，对中国文学研究事业近代化的推进与创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以京都学派中国文学学者青木正儿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青木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成果，具体到其独特的研究视角、解决了何种问题、开拓了何种方法论等，目的就在于“以斑窥豹”，最终能够对京都学派中国文学研究的特点有所了解。陈平原指出学术史研究“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②而本书对以青木为中心的京都学派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梳理和考察，站在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对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生成的一种追根溯源。在文学研究纷纭错综、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似乎有必要稍微停顿下来，

①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第337页。

② 陈平原：《“学术史丛书”总序》，载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